

乱花

江 曾 培

乱花迷眼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化老人话老年	1
巴老的书桌	6
春愁黯黯悼吾师	10
长松自是拔俗姿	16
龙应台印象	20
在梵高、伦勃朗的画前	25
林肯纪念堂前的遐思	30
“朝拜贝多芬”	36
《张元济传》的启迪	38
贵在勇敢与真诚	40
苦难造就伟大	42
“求同”又“求异”	45
审美的鼻子	47
莫扎特与《伤仲永》	49
黄昏恋喜得“宁馨儿”	51
《苍天在上》随感	55

美国反对美国	59
把“华文”与“世界”连起来	61
净土	64
一串五彩缤纷的文学珠链	66
谁是可尊敬的人	70
注日照亮别人的火焰	73
享受工作	77
需要困难	79
满足与不满足	82
痴思长绳系日	85
“人死观”	88
不为“老”累	91
幸福递减律	94
“物质化的精神享受”	97
恶趣	100
人无信不立	103
归来乎,羞耻之心	106
得理让人	109
礼让	112
一要干净,二要干事	114
功夫在台下	117
人际交往中也要打“假”	120

药以对症为贵·····	122
以丁生为鉴·····	125
执著与超脱·····	128
休闲更是一种心境·····	131
遗忘是“过滤器”·····	134
吸烟者要“迁就”不吸烟者·····	137
从文豪的嗜好说起·····	140
穷得只剩下钱·····	143
冲一冲习惯思维·····	149
烦恼即菩提·····	151
草簇的遥看·····	153
说“伪装”·····	155
狐狸的名片·····	158
论只“看”不“读”·····	161
“书中自有颜如玉”另解·····	164
同名同姓与盗名欺世·····	167
盗名欺世与污名污世·····	170
下士窃名·····	173
“最甜蜜的语言”·····	176
想起大众化·····	179
软硬兼施·····	182
“认价不认货”·····	185

有感于“借珠卖椟”.....	188
“羊毛”容不得变着法儿“拔”.....	191
不能仅止于“曝光”.....	194
六耳猕猴亮相的启示.....	197
“酒香”与“巷子深”.....	199
重视“第三者”.....	202
娱乐、文化不宜“一锅煮”	205
憧憬“淘书乐”.....	208
文明离不了“文”.....	211
跷足的滑稽世相.....	215
居住空间的“公”与“私”.....	218
安得宁静留人间.....	222
愿君且安宁.....	225
笑也有品位.....	228
关于“可读性”的对话.....	231
多出好书.....	235
抓好“保留节目”.....	238
循名责实.....	241
出书不宜“越位”.....	243
想起了“张好古”.....	246
“人生处处极短篇”.....	248
长话短说.....	251

在“精”字上下功夫·····	254
城市之肺·····	256
人行绿云中·····	262
走访滑铁卢·····	267
人造的圣诞·····	272
芭堤雅游思·····	274
后记·····	277

文化老人话老年

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一场骤雨，洗刷了盛夏的几分炎热。上海的几位文化老人，来到丁香花园小聚。丁香花园树木浓密，绿草成茵，有着“空翠湿人衣”的意境，是上海老人消夏纳凉的好去处。

先到的是 82 岁的《新民晚报》社社长、杂文家赵超构。他自 30 年代投身报界以来，杂文创作长期不辍，被称为“杂文界之最”。50 年代开始，他以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设《未晚谭》专栏，几乎每日一篇。“文革”中，被迫辍笔。80 年代后，他老店重开，仍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重新“放”起来。他的文章入情入理，刚柔相济，深入浅出，微言大义，深受各阶层读者的广泛欢迎。许多读者看《新民晚报》，首先是看《未晚谭》。近年来文章更加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有人赞之曰：“林放文章老更成”。但是，有谁知道，这位杂文大家现在是挂着心脏起搏器在坚持写作的。“文革”前，我在他领导的《新民晚报》工作过，我们同仁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将”。这天，一见面，我说：“老将，近来身体好吗？”他说：“还好，只是两腿

乏力，不能多走路了。”我一看，果然在他的身旁，多了一根竹节拐杖。但他精神仍很健朗，谈起目前杂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杂文家有坐“冷板凳”的寂寞，他说，写杂文的人，既要不甘寂寞，又要甘于寂寞。说不甘寂寞，是看到世态人情，有感即发，破一破周围的沉寂空气；说甘于寂寞，是要有准备坐好“冷板凳”的心态，“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说，这就是写作杂文的应有情绪。实际上，这也正是他这位杂文大家的情绪与性格。

接着，83岁的散文家、电影剧作家柯灵，在夫人陈国容的陪同下到了。柯灵的道德文章，一向为我所崇敬，他最近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序言，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好评。为了写好这一序言，他认真阅读了散文卷里180家的365篇作品，计120万字，还查阅了当年60多种散文集。初稿写成后，自己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为此，他又重点研读了何其芳、周作人、钱钟书、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集，并参考了有关文学史的著作，终以深沉的历史眼光与当代的审美意识，创作了这一见解不凡而又情文并茂的序文。全文仅8000多字，柯灵为它花去了三个多月时间，其间放弃了三次外出开会与视察的机会。对比当前文坛上那种粗制滥造、马虎草率的风气，柯灵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实在值得大大发扬。柯灵多年前就在酝酿创作《上海一百年》长篇小说，但因零星求稿者不断，致使他的长篇迟迟未能动笔。

为了减少他的外界干扰，我们出版社曾想为他安排一个僻静的写作地方，但他觉得自己能解决，就不要麻烦出版社。我们知道他经济条件并不富裕，长篇上手后别的东西写得少了，会影响收入，因而在去年上半年，我们为《上海一百年》开了一点预支稿费送去，他却婉拒了。他说：“我感谢出版社的关心，但我的书稿还未写出，能不能写好还难说，这个钱现在不能拿。”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我曾上海的一次文艺座谈会提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今天见面，我还是敦请他及早集中精力写《上海一百年》。我说：“这个有意义的作品，只有你能写得出，我们等待着，读者等待着。”他笑嘻嘻地说：“好呵，好呵！”

随后，82岁的作家罗洪，80岁的翻译家朱雯，75岁的编辑家范泉，76岁的出版家丁景唐，以及85岁的作家施蛰存等，都先后来了。施蛰存以编辑30年代的《现代》著名，被称为“现代”派作家的代表，实际上他学贯中外古今，既撰写现代小说，又研究古典文学，既搞作品，又事翻译。前几年他曾动了一次大手术，现在身体甚好，话音响亮，语多幽默风趣，他一来，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当丁景唐谈及上海文艺出版社拟编辑一本《文化老人话老年》的图书时，他乐开了，说《西塞罗文集》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不过，西塞罗只活到63岁。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真正要写出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恐怕还

是他们这批七老八十的人。他说，提起老年，往往想到晚年。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画等号。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还没有死，这年龄叫晚年。如果离死去还甚远，即使七老八十，也不能说是他的晚年。他说，他第一次退休，是在1975年，工宣队送他回家，祝颂他晚年愉快。他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到今天，16年过去了，他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祝颂老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咒诅他快死呵。

是的，老年人并不是都进入了晚年。政清人和，长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跨入老年的人，离晚年还远呢。坐在施蛰存旁边的许杰，91岁了，是当今上海年龄最大的作家。他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惨雾》，茅盾赞之为“一篇杰出的作品”。现在尽管年届耄耋，犹壮心不已。他赋诗道：“晚来识得人生味，归咏春风大有年。”“晚来识得人生味”，老年人有着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归咏春风大有年”，老年人有着自己不辍的追求。这都是弥可珍贵的。特别是对这些著名的文化老人，人类的智者，正如几千年前的管仲所说，“老马之智可用也”。

说着，说着，施蛰存像被蜜蜂螫了似的，右手抓住助听器尽甩，最后把它摔在桌上，摇头叹息。原来，他的助听器失灵，变成了聋子。柯灵很快地把自己的助听器借给他

使用。他听了一会儿还是摇头，说产品同样没有“过关”。由此大家议论起对老人的用品，往往粗制滥造，漫不经心。就说助听器吧，质量常有问题，有的音量不清，有的又特别敏感，自己打个喷嚏，能放大成一个响雷，把自己吓了一跳。而且不时会坏，坏了又不大有地方修，使失聪的老人很苦恼。就像施蛰存，刚刚滔滔不绝，谈笑风生，但与外界的声音联系一旦切断，他就“顿失滔滔”，神情变得木然。有人建议同样带有助听器的林放为此事在报上“放一放”，林放说：“老人用品利润不高，放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用”。

但是，大家说还是要“放”。目前，全世界高龄人口不断增加。按联合国规定，老年人占人口7%以上的国家称为“老年型国家”。上海老年人口已占14%，早属了老年型城市。如何关心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解决他们的一些特殊需要，实在是要全社会加强重视的。就这些文化老人来说，他们的思维都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少有“老”态，这可能与他们长年用脑有关。他们的老态较多地表现在腿上、眼上、耳上、牙上，能不能在这方面多用点力，帮助他们克服年老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那种对社会来说不可或缺的“余热”。

1992年9月

巴老的书桌

癸酉春节前夕，我与几位同事，照例去向巴金大师拜年。巴老的家，位于上海西区。这是一幢花园洋房，环境十分幽静。巴老安坐在底楼客厅的向南的一角，正在阅读《巴金全集》的校样。“文革”前出版过《巴金文集》14卷，现在增补至20几卷，计划在近一两年内出齐。巴老见我们来了，放下样稿，双手按着座椅的把手，打算站起来招呼。我急步走向前去，祝他新春愉快，并献上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祝愿他健康长寿的花篮。巴老连声谢谢。

巴老因患帕金森氏症，行动不大方便，但脸上气色不错。他说，只要天不落雨，他每天都要由家人扶着，在花园里散一会儿步。大部分时间，就坐在书桌前读读写写。由于眼力不济，报刊上的字体又小，“读”，愈来愈被“听”所代替。在他的身旁，时刻伴随着一架小小的收音机。由于手颤抖得厉害，写字困难，每天只能写几百字，但他仍然坚持在写。去年，我们出版社约请范泉先生主编一本《文化老人话人生》的书，请巴老写一篇，巴老用颤抖的手，连续几天，写了改，改了写，认真而又艰难地为这本书写下

了六页稿纸的宝贵文章，题目叫做“向老托尔斯泰学习”。巴老写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要好好利用它。我渴望安静，也只是为了勤奋而有效地使用这支笔。”巴老与托尔斯泰一样，都是他们各自时代的良心，坚持“说真话”，始终履行着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巴老太累了。前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张锲、周明同志，特地由京来沪劝说巴老到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巴老现在的好气色，与这次休养有很大关系。我们劝巴老不要太劳累，隔段时间可以到他所喜欢的杭州或别的什么地方去疗养疗养，巴老笑呵呵地说：“好，好！”

巴老的记忆力极强，思维仍然十分活跃，一点也未见衰老。记得几年前，我们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打算把台湾作家杨逵于30年代写的《送报夫》选进去，由于这一作品的全文，最初是用日文在日本发表的，后来谁率先把它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的，一时闹不清。我们求教于巴老，巴老当即回答说，译者是胡风，1936年收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回来一查，果然如是。这天，我们又谈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些人和事。巴老都记得很清楚。巴老不仅是一位大作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家。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担任过14年的总编辑。著名的《文学丛刊》，就是由巴老主持编辑的。巴老编书，不仅组稿、看稿、改稿，而且亲自设计、发印、校对。他还记得当年为了改正排印中的一本高尔基

作品中的错字，跑到印刷厂求排字工人当场改好，一位青年工人因急于赴女朋友约会，显得不耐烦，他既体谅他的心情，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使这位工人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

谈到这里，我猛然注意到，在巴老的书桌上，除了一叠校样外，赫然放着的是一架放大镜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座的巴老弟弟李济生编审介绍说，巴老遇到一些把握不定的字、词，就要翻翻这部词典。同时，他向他的晚辈都送过字典、词典，要他们勤查字典，不要把字用错。我们为巴老这种字斟句酌的认真精神所感动。感到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人，太需要向巴老学习了。现在书刊上的错别字触目惊心，已经到了“无书不错”、“无刊不错”、“无报不错”的地步。究其原因，除囿于知识水平外，主要是态度不认真。在如今的编辑案头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巴老那样，认真地放着一部词典，更不是每个人都像巴老一样，遇到疑难的字，都认真地去查阅字典，弄个明白的。相反，往往是粗枝大叶，漫不经心，让错别字一个个从自己的眼皮下顺利地滑了过去。对比之下，我们向这位 88 岁的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巴老却表示，他也粗心草率，过去经手编校的书，也有出错的地方，为此常常感到内疚。这，在我们听来，更体现了巴老严于要求自己的精神。巴老当年正是依靠这种精神，联系与团结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出色地编辑出版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

重要影响的《文学丛刊》。当时，曾有人问鲁迅为什么喜欢和巴金一道工作，鲁迅说：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认真，体现在今天的文学泰斗还像小学生一样，在自己的书桌上仍然放着一本汉语词典。

巴老的书桌，放了一本词典、一架放大镜与一叠样稿外，所余的地方就很少了。这张书桌只有通常的写字台三分之一大，下面又未装抽屉，犹如小学生用的一种简陋的书桌。我向李济生先生建议，是不是可以改用一张大的写字台，让老人读写时宽敞些，舒服些。巴金回答说，不用，不用，还是现在这样的好。原来，巴金读写的地点，根据需要，不时在家里有些变化，用这样一张小书桌，搬动起来方便。巴老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谁能想到，这位文学大师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书桌上，以一双颤抖的手，仍然艰难而不屈地继续在“付出”他的智慧与才华，“给予”人们以温暖与光明。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担心过多的谈话给老人带来疲劳，遂起身告辞。巴老双手按着座椅的把手，要站起来相送。我们都说不必了，但老人坚决而艰难地站了起来。他一手撑着手杖，一手由家人扶着，半步半步地向前缓慢移动，直把我们送出客厅。同来的一位年轻的副主编，系第一次拜谒巴老，他说他是带着“朝圣”心情来的；来过以后，他确实感受到“圣”光了。

1993年3月

春愁黯黯悼吾师

辛未羊年除夕，时届子夜。楼外除旧布新的爆竹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壬申猴年来临。我接到第一个拜年电话，是《新民晚报》赵在谟兄打来的。他告诉我：“老将病危，已送华东医院抢救。”“老将”者，即《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50年代起，赵超构主持编务，大展抱负，同仁都尊重而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将”。随后，蔓延到整个新闻界，以至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一般读者都知道晚报有位杂文家林放，数十年来在《未晚谭》专栏撰写文章，几乎每日一篇。“文革”中被迫辍笔。80年代后，他老店重开，重新“大放”起来。他的文章平易通畅，朴实精练；入情入理，刚柔相济；深入浅出，微言大义；《未晚谭》专栏深受各阶层读者欢迎。时人赞之曰：“林放文章老更成”。而赵超构这一本名，在读者中知之者却不多。

我在电话中问在谟兄：“老将住几室几床？”在谟说：“医院关照，为了不干扰治疗，要求探望的人越少越好，你暂时不要去看他。”我唯唯。决心不管医院吩咐，打算在节日期间去看望他。“老将”是我走上报坛、文坛的一位最有

影响的领路人。1956年2月，我23岁，初进《新民晚报》，当时报社刚合营不久，编辑部人员大多是1949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青年很少。“老将”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新民晚报》的历史，讲述了新闻工作的要求，勉励我大胆地干。他说，《新民晚报》需要你们这样生龙活虎的青年人来龙腾虎跃。他安排我做记者，到新闻第一线去摸滚摔打。随后，当他发现我有一点理论素养时，又及时鼓励我学写言论。他说，要锤炼自己成为多面手。实在说，我当时社会知识甚浅，文学根底又不深，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概念，不符合报纸言论的要求，更不符合杂文的要求。老将身传言教，亲自点拨，使我得以较快地进入杂文之门。后来，林放因公外出时，他在一版上的专栏《未晚谭》，也要我写。这是“老将”无私地扶掖后生之举，因而有人以“小林放”称呼我。我清醒地知道，我的杂文水平与林放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尽管冠以“小”字，也是难于蝉联在一起的。1990年，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海上乱弹》的杂散文集，在“跋”中，我简略地提及我写杂文的历程，其中有这样几句：开始，我的文字多“言论老生”式的面孔，呆滞，干瘪。晚报社长林放系杂文名家，他给了我指点，认为写杂感这类东西，应力求“杂”而有“文”。当时他每天写一篇杂文，思想锋利，行文活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总是反复研读，吸取教益。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自己遂稍有长进。”我将此书送给“老将”